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五十七期 2005 年 3 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57, March 2005.
〈問題與討論〉

台海上空的粉紅色幽靈*

吳介民

Pink Specter over the Taiwan Strait

by
Jieh-Min Wu

* 感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邀請作者寫作此文，尤其是錢永祥、徐進鈺兩位先生的鼓勵與耐心等待。定稿前曾經幾位師友指正，在此致謝。

通訊地址：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服務單位：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以及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email: wjm@mx.nthu.edu.tw



一、問題

佩里·安德森在〈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針對班納迪克·安德森對於台灣民族主義性質之設想，提出限定與質疑。根據後者的構想，台灣的民族問題，基本上可以適用「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 的詮釋架構¹。然而，佩里·安德森認為，由於諸種特殊歷史機緣，使得台灣「在這門類裡與眾不同」²。在他所提出的幾個特殊性之中，最突出的是美國在台灣海峽所扮演的角色：「台灣個案的特殊之處是，這裡主張獨立的國族本身，卻完全仰賴一個外在強權。過去一個世紀與大陸的隔離 (separation)，塑造了台灣的特定經驗，但這隔離一直是帝國的作用，而非針對帝國的反叛。日本和美國先後兩個宗主國，是最重要的條件。台灣從這樣的條件中所產生的民主政治的活力，無論以任何標準衡量，都令人驚嘆，足以令其兩個宗主國汗顏。但是，根本的現實並沒有變：台灣依然是美國帝國強權的保護國 (protectorate)。³」這個近乎命定式的歷史條件，在後冷戰時代，尤其是中國藉著市場經濟崛起之後，再加上兩岸之間懸殊的領土與人口對比，尤其顯得咄咄逼人。令人好奇的是，在處理美中台三邊關係國際層次的互動上，佩里·安德森以相當接近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realist) 的語言，描繪出台灣動彈不得的情勢。文章最後說：「歷史地看，(兩岸之間)某種形式的重新結合 (reintegration)，似乎是長遠進程中最有可能的結局。」這樣的結語，讀來就不是特別發人深省了。

1. 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2001)。

2. 佩里·安德森 (2004: 229)。

3. 這裡的引文，主要參照王起華的譯文 (佩里·安德森, 2004: 234)。但為求精確，筆者有時根據原文而作小部份的改譯 (Anderson 2004: 8)。下同，不贅。這裡請讀者特別注意，我把 separation 譯為「隔離」，而非「分離」，是因為安德森在其文章中同時使用了 secession 這個詞，因而在中文概念上將兩者做出區分乃攸關緊要。請參見本文最後一節。

但是，佩里·安德森的論文提醒我們，台灣在處理兩岸以及美中台關係上，面臨的根本難題是：過去幾十年來台灣在安全方面，高度依賴美國，如今隨著國際與國內局勢的結構性改變，是否可能擺脫、以及如何擺脫這種依附情境？

王超華的〈國族主義在臺灣〉，對於佩里·安德森的論題有深入而尖銳的評論；也對前述問題提出中肯的分析⁴。這篇文章藉此對話機會，對台海情勢發展的根本癥結，提出一個前提性質的分析。這個出發點順著前述安德森認為的兩岸問題特殊性而提出，亦即，在將統獨選擇的議題納入政治日程表之前，我們須先思考：台灣作為美國的保護國的前因後果。這個問題，在一定的意義上，是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但是，其歷史成因還必須追溯到台灣從日本殖民者手中脫離出來的方式。

二、類殖民體制

台灣作為美國的保護國所滋生的問題，為何在冷戰結束十多年後依然糾纏著我們，國際因素暫且不論，最主要的原因是，在過去將近二十年間的民主化過程，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民主改革進程的影響，並沒有得到清晰而普遍的認識，因此從來沒有被納入民主改革的議程。直到國民黨逐漸失去中央政權之際，藍綠權力之爭背後的族群——國族認同角力激烈化，問題的線索才浮上臺面。這是什麼問題呢？就是台灣從 1945 年之後，國民黨所建構的國家機器的性質——內建於美國帝國勢力範圍內的類殖民體制（quasi-colonial regime）——在思想上一直沒有得到徹底的批判清理。因此，這個歷史幽靈也就隨著兩蔣王朝遺傳下來，歷經李登輝時代所謂的「寧靜革命」而一直延續到目前的民進黨政府。換言之，民主化的過程，沒有同時解除這個類殖民體制的弊害，連帶使得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也

4. 王超華（2004）。



得不到妥善的處理⁵。

從 1950 年代以來確立下來的統治台灣社會的政權，歷經兩次重要的歷史轉折。二次大戰結束後，盟國將台灣交給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陳儀的行政長官公署接收了日本殖民者遺留下來的龐大資產，並且繼承了日本殖民國家所建構的穿透台灣社會的基礎結構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以及一個具有某種程度現代性的社會。這種形態的接收，根本沒有實現人民翹首企盼回歸祖國應該帶來的解殖正義（decolonizational justice）。接收不到兩年發生的二二八屠殺，決定性扼殺了一個後殖民社會可能獲得人民自決的歷史機會，也就是佩里·安德森所說的「威爾遜式契機」以及「列寧式契機」的錯失。這是 1949 年國民政府作為「外來政權」在台確立統治的一個歷史前提。

1950 年六月爆發的韓戰，是確立類殖民體制的一個更直接的歷史因素。本來美國已經打定任由中共攻打台灣的放手政策，但是韓戰吹起了東亞冷戰的號角。該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台灣中立化方針」：（1）第七艦隊封鎖台海、阻止中共攻台；（2）阻止國民政府進攻大陸；（3）台灣之將來國際地位由聯合國檢討。美國的確做到了前兩點，第三點卻留下歷史尾巴。即使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71 年取代中國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時，也沒有處理這個問題。因此，在國際法理上，「台灣地位未定」，以及「通過人民自決來決定台灣國際地位」等訴求，一直有相當的說服力。

台灣被納入美國霸權的勢力範圍以及龐大的軍事援助，使國民黨免除了被「赤化」的外患；而經濟援助的到來，則幫助國民黨控制了通貨膨脹。美國的保護傘以及日本殖民遺產這雙重歷史條件，使國民黨能夠有效執行黨改造等一系列政策，建構以特務為基礎之白色恐怖統治，確立了軍事威權體制。就政治壓迫面而言，這個體制是國民黨與美國政府合謀，強壓於台灣社會的產物。冷戰——白色恐怖時代，

5. 對轉型正義的討論，參見吳乃德最近的論文（Wu, 2004）。

國民黨對台灣社會的統治，是一種類殖民體制，而非典型的殖民統治，它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結構特徵與歷史後果。

第一，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能力，內建於美國霸權勢力範圍，是一種在國際層次上之帝國支配在國內層次上的延伸。美國通過與國民政府的結盟，干預台灣社會內部的發展。根據 Michael Mann 對於帝國形態的分類，美國對於蔣介石政權的影響力，相當接近他所界定的「非正式帝國」的支配關係⁶。雖然國民黨的對內控制在形式上享有充分主權，但其行動的自主性卻受到美國帝國勢力的嚴重箝制。除了軍事政治方面的限制，通過國民黨對其依附，美國得以主導台灣的經濟發展方向⁷。同時，帝國支配帶來統治者的文明優越心態，使台灣社會陷入雙重的邊陲性。一方面是國民黨政權以中華文化道統的繼承者自居，系統性地歧視打壓各種本土語言文化；另一方面是整個台灣社會（包括當時的外省籍統治菁英）對於美國政經、語言、文化霸權之近乎無意識的順服⁸。

第二，國民黨統治團體以外省籍組成，統治菁英掌握國家機器以及龐大的國營資產，壟斷政治權力與中高層政府職位的分配。這種壟斷，在各個領域中也存在著程度不等的制度化。這是國民黨作為從外部移入台灣之政權（emigre regime）的統治本質。儘管如此，冷戰

6. 參見 Michael Mann (2004)。

7. 參考 Ronald Robinson 對於非正式帝國主義的描述：“Coercion or diplomacy exerted for purposes of imposing free trading conditions on a weaker society against its will; foreign loans,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support to weak states in return for economic concessions or political alliance; direct intervention or influence from the export-import sector in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weak states on behalf of foreign trading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lastly, the case of foreign bankers and merchants annexing sectors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of a weak state.” 引自 Mann (2004: 4)。

8. 當代台灣左派論述的先行者陳映真曾經如此反思：「我在『文學季刊』開始寫些隨想的东西，當時也曾把一些不必要的英文字眼夾在文章裏，顯然是崇洋媚外。當時，我對西方的影響已經有了反抗的意思。可是，即使如此，我還是樂此不疲，甚至到了今天，有時候和人講話偶爾還有幾句英文單字。這是一種心態，是整個文化空氣之下，我們的處境。」見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引自尉天聰（1978：63）。

結構下的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政治和社會領域，並不只迫害本省籍反抗者，也無情鎮壓外省籍異議者⁹。因而，白色恐怖的統治特質，並不像典型的殖民統治。外省籍反抗者曾經在 1950 年代與本省籍人士攜手合作嘗試過組織反對黨。這個運動雖然遭到鎮壓而失敗，卻留給人們一個關於民主化的美好想像：假如從 1970 年代開始的黨外民主運動的主導力量，能夠抓緊解殖正義（反殖民、反威權、反剝削）的軸線，而不只是環繞在族群之間權力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上打轉，那麼我們或許可以免於當前的族群政治惡鬥¹⁰。1960 年代，反抗運動歸於沈寂，黨國體制已經牢牢掌控社會，白色恐怖陰影深植人心，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也逐漸展露其文化霸權的教化效果。在這個年代，幾乎沒有任何反抗，對國民黨造成威脅¹¹。筆者有個揣測，在此年代接受中學與大專教育的人們，可能是黨國教育以及美式「現代化」、「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灌輸最為徹底的世代。這個世代的菁英份子，在 1980-90 年代的民主化過程中，在政經文化各領域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這個世代的「政治人格」乃形成於冷戰——類殖民體制權力的高峰，因此表現於民主化階段的社會想像與行動方案，便受到上述價值觀與心態的重重束縛。

值得注意的對比是，相對於島內反對運動的沈寂，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在這個年代聲勢高漲，其性質接近班納迪克·安德森所謂的遠

9. 根據吳乃德從「戒嚴時期不當審判賠償基金會」獲得的統計數字，在白色恐怖統治的受害者當中，外省籍佔了大約 40%，這個數字遠高於外省人之不到 15% 的人口比例（Wu: 2004: 7）。

10. 關於 1950 年代的組黨運動，吳乃德提出一個有趣的反歷史事實的設想：「外省籍和本省籍政治人物的結合。這在族群關係上有重大的意義。如果該組黨運動不被壓制，台灣今天的族群關係或許會有很大的不同。」（吳乃德，2004：495）；另參見吳乃德（2002：77-78）。

11. 一個頗為知名的插曲，是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等人於 1964 年九月，試圖散發〈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失敗的事件。另外一件較少為人知的事件是，1967 年六月，林水泉等人組織的「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遭情治單位破獲，十餘名參與者被判重刑。

距民族主義 (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這股海外運動的主導力量逐漸右傾化，於 1970 年代開始影響國內的反對運動論述與方向，並且在 1980 年代末期的自由化階段達到高峰。

第三，冷戰——類殖民體制對於台灣的烙印，一直存在著曖昧的两面性。台灣對美國的政治經濟依附，以及國民黨高壓統治的遺害，自不待言。然而，在此歷史結構條件下的台灣，卻開展了制度改革以及快速的經濟成長。拘束於冷戰對峙的「安全」情境中，台灣歷經了華人社會自十九世紀帝國主義侵略東亞以來未曾有過的長期「安定」。美蘇兩霸在冷戰的四十年間因為恐懼核子大戰而沒有開打，只在第三世界從事局部性的代理人戰爭。歷史學家葛迪斯 (John Gaddis) 稱之為現代世界政治史上少見的「長期承平」(the long peace)¹²。在美國與國民黨雙重支配之下的台灣社會，先是經歷了土地改革。國家取代地主，成為汲取農業剩餘的媒介，為其後的工業化預先鋪設了一個社會經濟條件。冷戰前期的韓戰以及隨之而來的美援救了國民黨。美援對於台灣的深刻影響，可見於當時常民社會的語言。「美援」一詞在閩南語日常對話中，轉化為「免費」或「免費招待」的隱喻。幾十年後，人們猛然發現，美援絕非免費，而是提前消費，延後償還。這個問題，直到最近對美六千億軍購預算的爭議，才引起警醒。

此外，冷戰中期的越戰，使台灣在美國大量戰備品採購中分沾到部份經濟利益。1960 年代啟動的加工出口工業化，造就了一整個世代的「黑手頭家」。這個「經濟起飛」的故事，與越戰年代國際政治經濟的變動，存在著深層的結構關連。

第四，這個體制帶給台灣一個長期的社會文化效應：反共、保守、依附權勢的集體心態。前文已經提過，台灣社會長期對美國文化霸權近乎無意識的順從。加上威權統治，使人們更難以在日常生活中

12. Gaddis (1987, 1997).

對此體制產生批判的態度。二二八、白色恐怖對社會的深遠影響，陳映真在 1980 年代的小說中有動人的描述。因國民黨移入而受害的一代，心中充滿怨懟，但無法公開表露和抵抗，只能在苟且委屈中求生存，而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但是這種寄託的內在精神，並不是鼓勵他們獻身社會改革，而是一種結合內心哀怨、對權力者委屈逢迎、以及自身求上進的「生存之道」。「避開政治、用功讀書、努力工作」成了主宰台灣社會的精神狀態。我們在〈山路〉和〈夜行貨車〉等小說中都不斷看到這種精神的複製。〈山路〉中，蔡千惠這位仰慕革命青年和左派理想而自我犧牲的偉大女性，佯稱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李國坤的妻子，到李家尋求救贖，非但沒有將恐怖的真相告訴他的小叔國木，竟也（不得不）以上述方式培育國木。而在〈夜行貨車〉中，主角詹奕宏那因為改朝換代而失意的父親，也是如此教育兒女。

從這裡派生出對於資本主義之惡性面欠缺反思的右傾社會心理，帶來嚴重的後果：對於左派價值的無知、污名化。此處批評的反共心態，需要特別說明。筆者並不否定，中共政權作為統治集團，在大陸高壓專制的事實，這的確是台灣社會恐共心理的一個來源。但是，就本文的論點而言，恐共所表徵的深層心理，是對於追求社會平等解放的價值（左派的理念），未經批判性的思考，即產生迴避、畏懼、或嫌惡的態度。人們也因此難以如實面對中國大陸自共產革命以來各個階段的變化。可以提問：中國經過二十餘年市場經濟轉型，在多大的程度上，還能稱為共產主義社會？當前中共的政權性質，在哪個意義上，仍可稱為社會主義政黨？這種認知上的困境，映射在兩種意識狀態的對抗上面：一方是對社會主義的無名恐懼，另一方則是對社會主義實踐之無批判的受納¹³。

集體反共心理，可說是冷戰——類殖民體制在鬆解之後，留給台灣社會最重要的負面遺產之一。

13. 當然，在兩方當中，前者在我們人口比例中佔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

三、體制鬆動，以及回應危機的方案

冷戰——類殖民體制的原型，在 1970 年代已經呈現鬆動的態勢。在美國的壓力與誘導之下，從 1960 年代啟動的加工出口工業化，促成了快速的階級流動與社會變遷，慢慢溶蝕掉類殖民體制中由國民黨統治菁英控制經濟資源分配的結構。同時，民間社會隨著「中產階級」的興起，逐漸有信心以及餘裕，提出自由民主的呼聲，要求政治權力運作的合理化。省籍之間政治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等，作為民主制度的一環，乃是社會反抗國民黨的特殊要求。但是這種政治要求，不能僅訴諸省籍平等（雖然這種提法在當時也是政治和文化禁忌，儘管政治資本與文化資本的不公，存在於日常生活的體驗當中），而必須訴諸普遍的價值觀，提出一套民主化的語言。中產階級的誕生，適時給予這個政治要求一個社會力的基礎。如前文指出，在黨外運動的階段，主流反對團體提出的社會改革觀，沒能把對於類殖民體制的批判注入此民主論述。但是，回顧歷史條件的限制，當時這個社會力本身就是體制的產物，難以期待對於自身做出反體制的批判。

1970 年代，美國為了聯合中國圍堵蘇聯，謀求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先在 1972 年簽訂了《上海公報》，而後於 1978 年締結外交關係。在此東亞冷戰結構解凍的契機下，中國大陸順勢推動改革開放，美國對其開放龐大的國內市場，從而帶動了國家社會主義體制向市場經濟靠攏的發展。這個發展，在某個程度上，可說是小範圍的「台灣奇蹟」在大陸的大規模複製，而奠定了今天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個條件。

在冷戰——類殖民體制鬆動的時刻，蔣經國正式繼承了權力。華府對於台海態度的微妙轉變，立即衝擊到國民黨對內統治的正當性。蔣經國採取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來對應法統危機，開放一小部份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吸納新生的不滿聲音。這個「革新保台」的「蔣經國

方案」，無意中為類殖民體制的變革，鋪設了一條歷史線索，但顯然無法滿足日益升高的民主化期望以及反對力量的集結，而終結於美麗島的鎮壓。

鎮壓美麗島並沒有解決國民黨的統治危機。社會要求民主的力量持續增長，促成反對運動的組織化，使蔣經國不得不於關鍵時刻讓步開放黨禁，而啟動了政治自由化。1988年，李登輝繼承蔣經國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在位的十餘年，台灣完成了基本的選舉政治民主化（包括國會全面改選以及總統直選）。李登輝路線對於台灣政治的長遠影響在哪裡？他被一些批評者描繪成「操弄民粹的政客」。這個批評並不精準。應該追問的是：李登輝時代有何歷史成就，以及為了這個成就，社會付出了哪些代價。他身為威權獨裁者指定的繼承人，也同時繼承了蔣經國遺留下來的體制變革任務，但是他卻以獨特的方式來處理這個歷史難題。他的青年時代正值日治到國民黨的改朝換代階段，那一代人對於解殖正義的未能實現，語言文化資本於一夕間斷裂，一直有著深深的情感壓抑。因此，當他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召喚民眾的素樸情感時，乃是以生動的修辭訴求1980年代黨外刊物所宣揚的台灣意識，也因此攫取了改革運動路線的領導權。他吸納順應社會的民主化要求，以本土化政策來解除威權時代的大中華意識形態以及許多制度上的不公平，並且以靈活的外交手腕開啓了與北京的政治互動。「李登輝方案」與「蔣經國方案」的一個內在聯繫在於：在不激烈地動搖冷戰時代建立的國家——社會關係的基礎上（這是革新保台的元素），李登輝逐步推動制度改革，並且善用因中國經濟崛起而引發之社會自我保護的心理需求（加上早已存在的不分省籍的集體恐共心態），將民主化與民族國家建構結合起來。這個方案雖然解決了舊體制的部份問題，卻無法處理台灣置身於國際強權中對美國的依附關係。事實上，這一條本土化民主路線反而凸顯了台灣在外部安全上，作為美國保護國的地位。李登輝時代頂多只解決了台灣社會雙重邊陲性的一部份——國民黨的文化政治霸權。

這是李登輝作為國民黨權力繼承人的根本限制，也是「寧靜革命」（實際上是「未經革命而和平實現民主化」¹⁴）所付出的代價。隨著「李登輝方案」在台灣內部成為主流論述，這條改革路線的動能，就逐漸轉化為一種法理——形式主義化的台獨主張¹⁵。而社會的獨立自主，作為一種反殖民、反威權，追求社會平等解放的可能性，便空洞化了。

四、當前的議題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深入清理冷戰——類殖民體制所遺留下來的各種正負面遺產，在我們做出國家定位（national identity）的抉擇之前，更清楚看到各種選項必須付出的代價？

台灣民主化過程最珍貴的資產是，儘管日本殖民統治撤退之後，社會歷經幾次的殘酷鎮壓，仍然能夠通過人民共同的努力締造民主體制。這是由下而上，發自社會內部的力量所達到的成就。這就是為什麼佩里·安德森會說：「台灣從這樣的條件中所產生的民主政治的活力，無論以任何標準衡量，都令人驚嘆，足以令其兩個宗主國汗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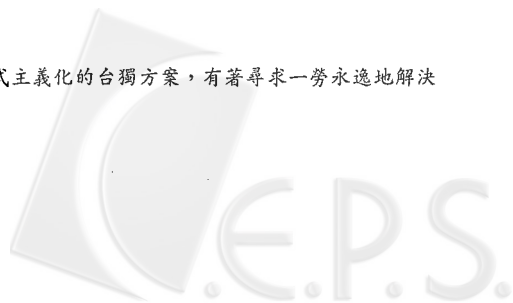
民主化運動對台灣這樣一個國際地位不確定的社會，勢必帶來不同民族主義之間的公開競爭以及國家定位的紛爭。威權時代被壓抑的各種身分認同隱語的臺面化，是社會集體治療不得不邁開的痛苦步伐，也是不同群體間建立社會信任的基礎¹⁶。

統與獨，是面對未來國家定位的兩種選擇，終究而言，是民主化運動必須通過的關卡，需要長時間經由公共領域的協商，以達成最起碼的社會共識。然而，目前討論國家定位的時機，幾乎都隨著選舉政

14. 王超華（2004：266）。

15. 在當前的氛圍中，這種法理——形式主義化的台獨方案，有著尋求一勞永逸地解決台灣地位問題的傾向。

16. 參見吳介民（2004）。



治週期起舞，而被捲入藍綠黨派的權力之爭。理性的討論空間被壓縮簡化到情感層面上的表態。「愛不愛台灣」，從嚴肅的提問，退化為爭取選票的速食補給品，進一步成為卡通化的媒體戲謔語言。統獨的選擇，原本應該可以和族群權力的紛擾區隔開來的。之所以造成難題，主要是因為台灣脫離日本殖民之後，解殖正義非但未能實現，而且在冷戰的結構下被凍結下來。民眾素樸的認同情感（接近 Eric Hobsbawm 所說的 *primordial nationalism*）得不到抒發，只能在被壓抑的情感狀態下，在族群間權力分配不均的現象中，去「指認」、「歸因」壓迫的根源¹⁷。假如說，威權時代最主要的政治矛盾不是「外省人欺壓本省人」這樣被誤認的命題，而是類殖民體制所衍生之國家對社會的統治關係，那麼，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權力重組產生的衝突，也不應該被誤認為「本省人反過來欺壓外省人」，而是因為類殖民體制的負面遺產，沒有得到歷史性的清理、轉型正義沒有實現所致。

最後，我想回到安德森的提問以及王超華的回應上面。台灣社會追求自主與解放的努力，不能跟已經被貼上標籤、被污名化的「分離主義」劃上等號。

說到底，海峽分合的抉擇，一直存在著兩個論述層次上的混淆。一個層次是基於根本性的理念價值而來，亦即在政治正當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層次上進行論辯。另一個層次則是基於現實生存需要而來的，亦即針對政治權宜性（*political expediency*）展開論辯。前者的話語特質環繞在：我們做這樣或那樣的集體選擇，是為了追求或保存某些理念價值。後者則是：我們不追問這個或那個選擇的價值基礎，而只是在特定選擇已經決定（或被決定）的前提之下，討論現

17. 必須指出，本省籍民眾認同台灣的素樸情感，並非（單單）起源於二二八事件或冷戰時代，早在日據時代的文學作品中即見端倪。吳濁流「亞細亞孤兒」的喟嘆，鍾理和筆下在大陸的「白薯的命運」，都表明了日據時代台灣人嘗試從「祖國」尋求生活機會或情感慰藉時所遭逢的深刻挫折感。

實利益如何安排和分配。目前的論述，主要籠罩於第二個層次，經常流於依附霸權的說理方式。正因為如此，台灣社會追求獨立、自主、平等的理念（及其可欲性），正面臨歷史上第二度的污名化。然而，這樣的污名化不能僅僅怪罪「統派」，「獨派」也須承擔責任。「李登輝方案」實踐十餘年後退化為一種法理——形式主義的台獨論述，使人們幾乎忘卻了獨立自主是爲了追求更深層的社會價值，而不只是滿足民眾在情感認同上的需求。獨立與否，便惡化成政黨間競爭選票的象徵符碼操作。因此，我們觀察到，當台灣意圖在國際或國內採取自主行動而面臨美國的壓力時，民進黨政府便做出政策宣示上的急轉彎。這種機會主義式的政治權宜，不過再度反映了美國對台灣的霸權支配。

海峽兩岸之百年隔離（separation），起源於作爲「母國」的清政府將台灣割讓於他國。而造成此事實的原因並不能歸責於台灣人民（包括所有族群），那麼，安德森所認爲的今天台灣要求自主獨立乃是 secession——從作爲民族國家的中國分離（分裂）出去的主張——勢必迫使北京政府採取「林肯式契機」（Lincolnian moment）之反應的這個論斷，在推理上其實是自相矛盾，同時，在政治實踐倫理上也欠缺正當性。接續安德森關於兩岸百年隔離的敘述邏輯，王超華的說法更加精確：

「台灣現狀，不是如佩里所說，在一個相對的 [標準國族國家] 內部尋求分離出獨立的政體，而是已經決然『分家』多年，現在要求正式『立戶』。和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類似，認可『分家』現狀並接受『立戶』並不等於取消將來統一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民主』並不是台灣向北京提出的實現統一的條件，而是在『立了戶』，有了平心靜氣討論協商的客觀條件以後，將來決定是否要統一時必須遵循的程序原則。……目前上升中的台灣主體性，要求的首先——而且是最主要的——是與中國大陸協商未來統獨方向的平等地位，是在沒有軍事威脅下每一位公民實施自

由意志進行選擇的必要條件，而不是排除未來統一可能的、洪水猛獸般的『台獨』。¹⁸」

王超華在此指出，佩里·安德森誤解了現階段主張獨立者的精神價值，同時也表明，中國還不是一個已經完成了現代性建構的標準國族國家。借用 Benedict Anderson 的說法，事實上，當代的中國共產黨，仍在艱困努力著將「中國」從傳統帝國（「天朝」）轉型為現代國家¹⁹。

「反對分裂」一向是北京政府對於台灣追求自主與平等的箝制性說詞。但是，當我們辨明了海峽隔離的事實，以及因為這樣的隔離所造成的歷史狀態，並不同於所謂的「分裂」，那麼，以強權（武力威脅）或利誘（「台胞優惠」）的方式，來迫使台灣接受北京所提出的統一框架或統一公式，在倫理上是站不住腳的。不論強權或利誘的話語，都是在政治權宜性的圈圈裡打轉。霸權式的思路，只會引來更多的霸權依信心態，不論是倒向哪個強權。

更徹底的思索，是在政治正當性的層面上以理服人。在這個層次上，經常被提及的「血緣、文化連帶」、「固有神聖領土」等傳統說法，說服力很薄弱。統一的要求，顯然需要更具現代性的說詞。如此一來，解釋的負擔是在北京那一邊。基於什麼現代政治論述的理據，北京有權利反對台灣從其想像的統一中國當中「分裂」出去？台灣在與中國大陸隔離百年，自身發展出民主社會的生活形態之後，北京要求台灣與之政治統合，其政治社會哲學的論述基礎何在？這是所有在應然面上主張海峽兩岸政治合併者，都必須嚴肅回應的問題²⁰。

王超華對於藍綠權力鬥爭，講得很犀利：「『愛臺灣』卻不能貫徹始終地『反強權』——無論是美國的強權還是中國的強權——正在有

18. 王超華（2004：267）。

19. 參見 Benedict Anderson（2001）。

20. 黃樹仁最近的論文，從東亞文藝復興的觀點出發，將台灣放在長程的視野中，提出一個關於兩岸政治關係分合演進的歷史觀，頗有創意（黃樹仁，2004）。

效地掩蓋著臺灣政治中最根本的內在矛盾。」²¹ 在這個問題意識上，「統派」對於中國政經社會現狀的欠缺反省批判，「獨派」依附美國、唱衰中國的心態，都沒有如實面對追求社會解放的真正難題——當社會面臨決定國家定位的時刻，有沒有摸索，台灣是否可能擺脫、以及如何擺脫霸權依附的幽靈？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 王超華，2004，〈國族主義在臺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6：257-270 頁。
- 吳乃德，2002，〈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關係的核心難題〉，《台灣社會學》，4：75-118 頁。
- ，2004，〈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收錄於國史館編，《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第七屆中國民國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
- 吳介民，2004，〈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領域的集體認同形塑〉，收錄於李丁讚等人著，《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
- 佩里·安德森（王超華譯），2004，〈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5：225-242 頁。
- 尉天驄編，1978，《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作者自行出版。
- 黃樹仁，2004，〈從兩岸僵局到東亞統合：台灣與中國的出路〉，發表於「帝國夾縫中的台灣國際研討會」，行政院文建會主辦，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承辦。會議地點：國家圖書館。12月18-19日。

21. 王超華（2004：269）。



英文部分：

Anderson, Benedict, 2001, "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ern Nationalism: Is There a Difference that Matters?" *New Left Review* 9 (May-June): pp. 31-42.

Anderson, Perry, 2004, "Stand-Off in Taiw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26, No. 11, June 3.

Gaddis, John Lewis, 1987,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nn, Michael, 2004, "Taiwan in the Web of Empires: Wars, Capitalism and Empires," keynote speech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 at the Edge of Empires," sponsored by Council of Cultural Affairs and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eld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Taipei, December 18-19.

Wu, Naiteh, 2004, "Transition without Justice, or Justice without Hist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Challenge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rgan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co-sponsored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and NSFG Foundatio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cember 3-4.

